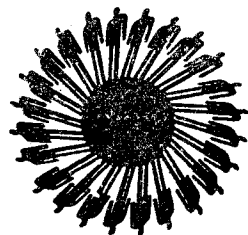




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

—国民党抗战内幕

K265.2
8



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

——国民党抗战内幕

石柏林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B 583749

封面设计：戴树铮

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

——国民党抗战内幕

石柏林 著

责任编辑：穆陵宁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大学印刷厂印刷

1989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11

字数：244000 印数1—2440

ISBN7-217-00607-4

K·75 定价：4.00元

新书目：89—22

录 目

绪 论	(1)
一、仓皇失措与焦土长沙	(47)
广州武汉失陷对湖南局势的影响	(47)
夜半火起 长沙遭巨难	(52)
“替罪羊”被击毙 “三颗人头万古冤”	(57)
收拾残局伪装同情 处理善后骗取民心	(63)
纵火者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	(68)
二、第一次长沙战役 湘北传“捷报”	(81)
相持阶段的到来与薛岳主湘	(81)
日军声东击西 守军防守未定	(86)
日军六路会攻长沙 守军陷于被动	(94)
抗击日军与动员民众	(108)
三、第二次长沙战役 湘北遭惨败	(122)
以攻为退 日军企图从武汉战场抽兵南进	(122)
日军集重兵于湘北一线 守军防守部署依旧	(126)
日军快速奇袭 守军损失惨重	(132)
围攻宜昌与郑州失陷	(148)
南辕北辙与战争败局	(151)
四、第三次长沙战役 同盟国	
战场上的首次胜利	(165)
太平洋战争爆发与香港作战	(165)
日军策应作战部署与守军	

防御计划的修改·····	(167)
日军轻敌冒进 守军诱敌深入成功·····	(178)
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胜利及其意义·····	(196)
五、六千壮士血染常德——日军打通大陆	
交通线的前奏战役 ·····	(214)
日军欲夺湘西屏障 守军防御拱卫陪都·····	(214)
“人在城在 人亡城亡”	
六千壮士血染常德·····	(222)
攻而无备 必遭失败·····	(241)
六、长衡失陷 国民党军一溃千里 ·····	(258)
日军面临的威胁与“一号”作战计划·····	(258)
第九战区的内部倾轧与薛岳的骄傲轻敌·····	(265)
第四次长沙战役惨败 张德能替死·····	(270)
衡阳血战四十七日·····	(283)
方先觉的投降与逃跑·····	(304)
长衡战役失败所带来的影响·····	(312)
长衡战役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318)
七、芷江战役——日军在	
中国战场的最后一战 ·····	(330)
盟军反攻局势的到来与日军的战略收缩·····	(330)
日军进攻芷江失败·····	(333)
日军迷梦的破灭·····	(342)
后 记·····	(348)

绪 论

自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出现了两个战场，即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利用游击战争粉碎了日军妄想把华北作为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补给基地的企图，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使敌后战场逐步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我国史学界对敌后战场的研究过去都比较重视，对正面战场则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涉及到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就更少了，往往都是用“自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

从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来看，日军在相持阶段中尽管用重兵在华北敌占区“扫荡”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其所谓“兵站基地”，^①但仍然没有放松对正面战场的压力，并不时根据其需要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军事进攻。而且，日军的这种进攻，在整个相持阶段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一样，也是相持阶段的重要战场。所以，要想全面了解相持阶段的抗战情形，就不仅需要研究敌后战场，同时也需要研究正面战场，尤其需要研究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场。

^①见日本防卫厅编：《华北治安战》。

(一)

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在地域上是广大的，在攻击势头上是多方向的。在此时期内，日军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都曾发动过攻势。在这一系列的进攻中，哪一个进攻方向、哪一个战场是主要的呢？也就是说，什么地方是相持阶段的正面主要战场呢？由于过去对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注意不够，相持阶段正面主要战场究竟在什么地方，在目前还是一个有待于研究探讨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日军进攻的方向虽多，国民党军队抵抗的地域虽广，但日军的主要攻击方向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抗击地带却集中在华中及其南部地区，即以湖南为主包括湖北、江西各一部分的第9战区（1940年初从第9战区划分出第6战区）。由于第9战区以湖南为主体，因此，第9战区战场亦可称作湖南战场。也就是说，湖南战场即是相持阶段的正面主要战场。

把湖南战场作为相持阶段正面主要战场，主要有两方面的理由：

其一，从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上看，日军攻占武汉后，虽然先攻南昌，再打南宁，然后又占领宜昌，甚至在西安方面也蠢蠢欲动，但这都只是根据需要而夺取某些战略要点的暂时行动，其主要攻击方向则始终保持着对湖南的南北夹击态势。日军的主要作战地区和主要打击目标指向湖南方面。日军攻占武汉后调整兵力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从1938年10月开始，到1939年12月，日军逐渐调整在华兵力。其兵力配置状况是：华北方面，黄河沿淮河以北、以及长江中下游京沪杭地区，是日军的所谓“治安区”，分别以重兵防守。华

北方面配置 9 个师团、12 个独立旅团，长江中下游及京沪杭地区配置 4 个师团、4 个独立旅团；华中武汉地区和华南广东方面，是日军的作战地区。武汉地区配备机动作战部队为 6 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广东方面配备有机动作战部队 4 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当时，日军在华兵力（不包括东北地区）总计约为 33 个师团（以两个独立旅团折合一个师团计算）。华北“治安区”日军约占其总兵力的 45%，长江中下游“治安区”约占 19%，武汉广东两作战地区约占日军总兵力的 36%。^①日军的兵力配置状况表明，它大约用了三分之一强的兵力对湖南方面保持着南北夹击态势。

日军的兵力部署，是根据日军对华作战指导方针进行的。1938 年冬，日军所确定的对华作战指导方针为：“确保占领地域，促进其安定，以坚定长期围攻态势，努力压制残存之抗日势力，使其衰亡”。“配置有力之作战军于武汉地方，牵制湖北、湖南及江西方面之中国军；又留置最小限度之兵力于广东地方，以遮断其国际补给”，“适时对猬集之中国军施行攻击”^②。日军之所以这样部署兵力，是考虑到“对被压缩中之国民政府，如放任不顾，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之，有实行一部作战之必要”^③。日军的这种意图，在豫湘桂战役以前一直没有改变。如 1939 年 9 月日军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时，大本营对其下达的命令中仍然指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之抗战企图”。^④1940 年底，日军大本营制

①《抗日御侮》第 6 卷，第 11—12 页。

②《抗日御侮》，第 6 卷，第 7—8 页。

③同上，第 10 页。

④《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1 分册，第 3—4 页。

定《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指示中国派遣军“战略指导的要点在于，在以治安为主的地区更加彻底地确保治安；在优势的敌人正规军聚集的地区，不断地积极进行作战，摧毁及消耗敌人的抗战力”。^①根据大本营这种作战指导纲要，中国派遣军就把摧毁国民党正规军的重点放在湖南方面，因而构成了武汉、广东两面夹击湖南的兵力部署。

其二，从国民党方面看，其防御和兵力配备重点亦在湖南方面。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所造成的南北夹击态势，表明了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日军进攻的重心将在第9战区。国民党军委会的防御部署及其兵力配备，针对日军的攻击势头，亦将第9战区作为重心。蒋介石亲派其心腹大将陈诚出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由薛岳代理其职并兼任湖南省主席。1939年1至3月，蒋介石调整各战区兵力。在全国10个战区中，其兵力分配状况是：第1战区，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第2战区，3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第3战区，22个步兵师；第4战区，18个步兵师；第5战区，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第8战区，6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第9战区，52个步兵师；第10战区，10个步兵师；苏鲁战区，7个步兵师；冀察战区，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②总计各战区兵力共有200个师。在以上所有战区中，以第9战区兵力最多，约占全国各战区总兵力的1/4强。可见，国民党军委会是将正面战场的重心摆在湖南方面的。

国民党军委会置重兵于第9战区，也是有其原因的。日

①《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二分册，第104页。

②《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8册。

军侵占沪杭及广州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沿海的封锁，所有海上交通完全断绝。中国唯一还能与外界进行联系的滇缅公路，成为重庆政府获取外援的交通命脉。当时，日军企图进攻缅北，切断这条交通线，把重庆政府完全孤立起来；同时，日军亦想沿湘桂路进入中国西南各省，一面配合缅北日军控制滇缅公路，一面直捣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把蒋政权消灭。蒋介石集团对日军的这种意图是清楚的。1941年1月国民党军委会对各战区下达的“作战指导大纲”中说：日军“除进攻我陪都、截断滇缅路，有深入作战价值外，其他方面，无深入作战之可能”。因此，军委会指出：“国军以总反攻求决胜之目的，应巩固陪都为全般作战核心，确保滇缅路交通，以利我国战略形势”^①。从当时的形势看，拱卫陪都、确保滇缅路的屏障，再好莫过于湖南。湖南省会长沙和湘南重镇衡阳，都是通向西南各省的门户和锁钥。有人称长沙为“湖南襟要”之地，“指顾伸缩，皆足有为，南出则连韶之项背可拊，东顾则章赣之肘腋可挟，西下则黔巫之咽喉可塞。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欲向北者，不得长沙，则马首无所托”。^②军委会对长沙、衡阳的重要性早已看到。军委会曾经指出：“长沙、衡阳乃江南心膂，交通枢纽。敌如攻略该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状态，不仅“削弱[我]尔后反攻之能力”，而且“有助于其尔后之南进”。^③因此，确保湖南，就等于守住了通往西南各省的大门；如果湖南不保，中国赖以抗战的后方基地——西南各省亦将不保，中国的抗战就难以持久下去。所以，军委会将重

①《抗日御侮》第六卷，第67—68页。

②《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第118—119页。

③《抗日御侮》第6卷，第56—57页。

兵配置在第9战区，尤其将其精锐或王牌如第74军等直辖部队放在第9战区，以便阻挡日军对湖南方面的南北夹击。

由上可见，中日双方均是把第9战区作为主要战场的。所以，我们说，相持阶段的正面主要战场在湖南方面，湖南战场即是相持阶段的正面主要战场。

作为相持阶段正面主要战场的湖南战场，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夏秋之际日军攻占湖南，其相持时间长达6年之久。

6年内，湖南战场的抵抗活动，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都产生了重大作用和深刻影响。

湖南战场首先给人以震惊的是长沙大火。1938年11月，日军从武汉沿粤汉路向长沙门户岳阳进攻，蒋介石以为日军要占领长沙并继续南进，下令将长沙焚毁。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在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命令的过程中惊慌失措，当日军还远离长沙二百余里时便放火烧了长沙。长沙大火是世界上继1812年俄国军官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之后的又一次大火，它使昔日繁华的长沙变成一片废墟，二万余人葬身火海，六万多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远离他乡。长沙大火使整个中国感到震惊。在全国人民的严厉谴责下，蒋介石找了酆悌（长沙警备司令）、文重孚（湖南省警察局长）、徐崑（湖南省保安第二团团长）三个替死鬼，了结此案。

接着，湖南战场又进行了著名的三次长沙会战。

1939年9至10月进行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中日双方在中国战场上的首次交战，此次会战，日军出动近十万人，分从鄂南、赣北、湘北三路会攻长沙。第9战区部队在湖南人民配合下，采用逐步抵抗、诱敌深入的战略（当时称“后退决战”），使日军知难而退，日军未到长沙就返回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使全国抗战得到鼓舞。第一

次长沙会战表明了相持阶段实际上的到来。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双方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较量。日军进攻的目的是要对第9战区野战军进行歼灭性打击，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以便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转用于太平洋其他战场。在日军这次以攻为守，以进为退的战役中，国民党部队丧师十余万人，是整个相持阶段失败最惨重的一次。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第一次并且获得空前胜利的战役，也是整个同盟国战场唯一取得胜利的一次战役。位于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为配合南方日军进攻香港而进攻长沙，结果被第9战区十多万部队包围在长沙附近，经过喋血苦战后始突出重围，大败而归。第三次长沙会战，成为相持阶段中国战场上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虽然在战争初期依靠突然袭击取得了胜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海空军的逐渐恢复和强大，从1943年下半年美军开始反攻后，日军就接连不断地遭到失败。日军制海制空权的丧失，迫使它开始考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因而于1943年11月至12月间发动了常德会战。常德会战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前哨战役，旨在为打通平汉、粤汉、湘桂诸线作好准备。由于抗战形势开始好转，而且日军想要占领的常德是拱卫陪都的重要屏障，国民党需要重点防卫，因此，中日双方在常德进行了一场血战。国民党王牌军第74军第57师坚守常德半个余月，最后师长余程万逃出常德城时仅剩300余人。常德保卫战是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抗击日军最悲壮的场面之一。

日军预期占据常德的目的没有达到，形势的日益逆转迫

使日军按原计划于1944年春夏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从豫湘桂三个战场来看,独数湖南衡阳守军作战最为英勇。第10军在坚守衡阳的40多天中,克服各种困难,对日军进行英勇顽强的反击,使日军进攻计划受挫。

1945年春夏,日军形势转危,日军指挥部开始收缩战略。在收缩前,为防止中国军队发动反攻,日军在湘西雪峰山地区发动攻势,企图摧毁芷江机场。此次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已经获得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前为强。因此,湘西会战以日军的失败告终。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日军在华进攻的结束,也标志着正面战场中日双方会战的结束。它是抗日战争史上的最后一次战役。

从欧战爆发后的第一次长沙战役开始,湖南战场先后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第二、第三次长沙战役以及豫湘桂战役的前哨战役——常德战役和豫湘桂战役的主体战役——长衡战役,到湘西会战为止,湖南战场一共进行了六次重大战役。这六次战役,基本上都是在相持阶段进行的。整个相持阶段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如果从第一次长沙战役算起的话,进行较大规模的战役共有12次,^①而发生在湖南战场的则有6次(上高会战亦由第9战区进行,如果算作湖南战场上的战役,则有7次),占总战役次数的一半以上。湖南战场所进行的诸次战役,其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下面是湖南战场6次战役中日双方参战及伤亡人数统计:^②

①这12次战役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大会战、老河口芷江会战。

②此统计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资料以及台湾、日本方面现在公布的有关资料综合而成。

战役名称	日军参战人数	死伤人数	国民党军参战人数	死伤人数
第一次长沙战役	近10万人	3600人	约30万人	3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战役	约12万人	7000余人	约50万人	10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战役	约6万人	5500人	约25万人	2万余人
常德战役	约10万人	约万人	约43万人	6万余人
长衡战役	约17万人	约5万人	30至40万人	9万余人
湘西战役	约7万人	2万余人	约20万人	2万人

根据上表来看，湖南战场的6次战役，国民党总共投入的兵力约计200余万人次，死伤30余万；日军投入的总兵力约计50余万人次，死伤近10万。中日双方投入湖南战场的兵力占各自总兵力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这种情况再一次说明了湖南战场是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场。

如果从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来看，湖南战场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按国民党的一般说法，国民党正面战场共计会战22次（一说24次），湖南战场的会战次数亦占了1/4以上。

(二)

作为相持阶段正面主要战场的湖南战场，其频繁的战事活动与重庆政府^①的对日战略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湖南战场的抗战活动对相持阶段重庆政府对日战略的形成发生过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是湖南战场的抗战活动体现了重庆政府对日战略的演变过程。

从湖南战场的战事活动对相持阶段重庆政府对日战略

^①抗战时期的重庆政府，是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它是与南京汪精卫汉奸傀儡政权相对而言的。

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影响来看，首先是长沙大火使重庆政府认识到相持阶段开始到来。武汉失陷后，蒋介石本来“只打算以衡山为防御中心”，^①没有固守长沙的意图，因而想用火烧长沙的办法阻止日军南下。然而，长沙烧掉了，日军并没有趁乱占领长沙，更没有南下的迹象。这一事实告诉重庆政府，日军大规模的攻势已经结束，相持阶段开始到来。蒋介石在长沙大火之后总结说：“日军占了武汉并且接着占领我们岳州以后，照敌人的理想，她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长沙和南昌。然而她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就证明她的力量不够，气势已竭”。^②可见，长沙大火虽然对湖南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但通过这次灾难性的事件，却使重庆政府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

根据长沙大火以后的形势变化，重庆政府制定了与这一形势相适应的对日战略。1938年11月25日，在第一次南岳会议上，蒋介石首次把中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岳阳沦陷以前为第一时期，长沙大火后为第二时期。他认为第一时期“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我们已经依照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达到了“消耗敌人、疲困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阵地的目的。长沙大火发生，日军并不趁机南下，说明日军已“陷于进退维谷”境地，最高统帅部的第一期战略已经成功。一旦这种战略“布置完成”，“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③的时候了。因

①史说：《长沙大火见闻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②蒋介石的演说全文见《蒋总统集》，第一册，第1058—1082页。

③《蒋总统集》，第一册，第1058—1082页。

此，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第二期实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对日战略。第二期“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的对日战略，立足点在“攻”，其中心任务即为整训军队，准备反攻。

第一次南岳会议重庆政府制定的对日战略，其意图还是比较积极的。其积极性主要表现在把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军队作战能力放在重点突出地位，并强调全国军队要在一年以内整训完毕，以迎接对日战争总反攻的到来。应该说，这还是一种建立在自己力量基础上的争取对日进行主动反攻的战略。在长沙大火后的对日战略上，重庆政府的消极抗战态度还没有显示出来。

但是，长沙大火发生一年以后，情况则起了变化。一方面，在西方远东慕尼黑政策压力下，重庆政府内部“主和”论调高涨；另一方面，由于欧战爆发，重庆政府的对日战略开始发生转折。

长沙大火后，日本国内的困难使它无法维持长期的消耗战，日本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中国事变”。武汉战役期间英法和德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曾使日本受到很大鼓舞。日本政府也想通过对英国施加压力的手段，让英美等国在中国再来一个“慕尼黑协定”。因此，从长沙大火时开始，到1939年第一次长沙战役之前，所谓“远东慕尼黑”活动便达到了高潮。虽然由于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太平洋会议未能举行，但当时各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出卖、瓜分中国的国际形势给中国人所造成的阴影，仍然留在人们心中。日军1939年攻占南昌后，发动随（县）枣（阳）战役，并集重兵于第9战区正面。在日军政治诱降、军事进攻并举以及英美劝降的情况

下，中国的抗战局势仍然十分危险。人们的抗战信心受到极大影响，重庆政府第一次南岳会议制定的“积极反攻”的对日战略发生了动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次长沙战役胜利了。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胜利，对重庆政府的对日战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第一次长沙战役使重庆政府认识到，对日战争的关键在于“我前方同志努力与否，以及努力有无成效”。1939年10月底，重庆政府召开了第二次南岳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总结第一次长沙战役前的形势时说：“湘北战争以前，国际形势一时极为黯沉。其时苏俄进军波兰，旋与日本签订落门坎停战协定；英法又以欧战发生，无暇顾及远东；美国对远东的态度亦无明确表示。国际人士及国内一般知识分子心理都很动摇，以为局势演变至此，前途不晓得如何危险”。第一次长沙战役取得胜利之后，重庆政府便认识到：

“无论日俄停战或苏俄进军波兰，与我国抗战并没有什么妨碍，而且我们抗战始终是靠自己努力。只要我们自身能持久奋斗，愈战愈强，国际形势”就会朝有利于我们的方面“着着好转”。“由此可知，一切事情全靠自己的努力，尤其要靠我们前方将士与党政负责同志”“加紧奋斗”。①

第二，第一次长沙战役中，日军士兵和日本国民所表现的厌战心理，使重庆政府克服了动摇畏敌情绪。第一次南岳会议，重庆政府虽然提出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对日战略，但当时对实施这个战略的态度还是动摇的。因为日本的军事力量在东方最强，军队的士气最旺，日军官兵那种

①《蒋委员长南岳党政军联席会议训词（一）》，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